



藏在庐陵古村肌理中的 浣陂彩擎

□ 朱宇婧

不久前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浣陂彩擎,在吉安市青原区浣陂古村的街巷间又一次登场,为八方来客献上一场非遗盛宴。

晨光初露,浣陂古村还笼罩在薄雾之中,梁氏宗祠永慕堂前已是一派忙碌景象。浣陂彩擎第三十三代传承人梁海红,正俯身检查即将登场的彩擎构架。从木料的拼接、铁艺的加固,到装饰细节的打磨,他一遍遍确认、一遍遍调整,神情专注而虔诚。40余年前,他还是被抱上彩擎的孩童,在4米高空感受寒风与敬畏;如今,他已是撑起这项技艺的守护者,从装置搭建、孩童妆造,到巡游流程、安全防护,事事亲力亲为,数十年如一日,托举起这门始于南宋的古老技艺。

“别低头、别害怕,看着前方,想象自己是一只飞翔的鸟。”面对即将登上彩擎的孩子,梁海红一边轻声叮嘱,一边为他们整理衣饰、抚平褶皱。这些稚嫩的身影,将化身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,立于高台之上,在巡游中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宗祠之内,烛光轻摇,循循古礼举行的仪式庄重肃穆,孩童净衣祭拜,族人凝神伫立,一个个环节藏着对先祖的敬畏,也让文化在无声中传承。

随着巡游号令响起,这场流动的“空中戏剧”正式拉开帷幕。台榭方正沉稳,立于其上的孩童身姿端凝,尽显古朴庄严之美;乌车车轮转动灵动,孩童身姿翩跹,一圆一方、一动一静间,蕴藏着中式美学的阴阳哲理。数十名壮汉稳稳抬举彩擎,龙灯随行、鼓乐和鸣,巡游队伍沿着青石板路缓缓前行,穿过古巷、跨过小桥、行经祠堂,所到之处,人群簇拥、欢声起伏,古老民俗的生命力在这一刻尽情绽放。

游客们驻足,用镜头记录这难得一见的民俗盛景;居民们扶老携幼,沉浸在熟悉的热闹与温情中;身着传统服饰的青年漫步其间,在古建与非遗的交融中感受庐陵文化的厚重。这一刻,彩擎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表演,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、连接乡土与人的纽带,让远行者望见乡愁,让年幼者读懂厚重。

浣陂彩擎绵延八百五十余载。梁氏先祖南迁赣鄱,将中原百戏技艺与地方民俗相融,历经岁月沉淀,逐渐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彩擎技艺,从最初的宗族祭祀仪式,慢慢成为古村最盛大的民俗活动,承载着耕读传家的理念、忠孝仁义的家风,也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精神信仰。它融木工技艺、铁艺构造、戏曲扮相、杂技韵律于一体,被称为“空中戏台”,是庐陵民俗文化的活态见证,也是赣鄱大地非遗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
在漫长岁月里,这门技艺也曾历经沉寂与波折。老一辈匠人渐渐离去,年轻一代外出谋生,精美构架蒙尘,技艺几近断层。以梁海红为代表的传承人,重拾祖辈手艺,走访老艺人、复原技艺、优化构架,让濒临消失的彩擎重新回到大众视野。从乡野间的小众仪式,到国家级非遗项目;从村内自发举办,到吸引数万游客慕名而来,浣陂彩擎让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。

暮色降临,巡游渐渐落幕,孩子们从高台上被轻轻抱下,眼中仍闪烁着兴奋的光芒,争相诉说着高空俯瞰古村的壮阔与新奇。梁海红望着他们,眼中满是欣慰。他知道,这些在高台上眺望过古村的孩子,早已在心底种下文化的种子;而他所守护的,是刻在庐陵儿女骨血中的文化自信。

当带着暖意的风再度吹来,彩擎再度凌空,我们看见的,是一枚庐陵文化版图中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在当下的蓬勃生长。它让藏在古村肌理中的文脉记忆,在烟火人间里重新焕发生机。



供图|吉安市青原区文化馆

赣籍学者汪辟疆的阅读密码

□ 刘飞云 刘周邦福



赣鄱大地文脉绵长,重学养、尚考据、精义理的治学传统一直植根于这片土地,滋养出无数文坛硕儒。

若要寻访江西籍学者的阅读典范,汪辟疆(1887-1966)无疑是最鲜明的标杆之一。

这位出身赣学世家学术大师,以“读常见书”理念立身,凭目录学、唐传奇、近代诗学的卓越成就扬名,从京师大学堂的青年才俊到南京大学中文系“三老”之一,其一生与阅读深度绑定——从经典古籍的深耕细研到独创读书方法的躬身实践,从战火中笔耕不辍的坚韧到批注典籍的治学坚守,更以赠书论道的文人雅韵影响同道,为当代全民阅读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实践价值的鲜活范本。

1

汪辟疆,名国垣,字辟疆、笠云,晚号方湖、展庵,禀受庭训,自幼便养成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。12岁从师学《春秋左氏传》,日抄《尔雅》100字,过目不忘;14岁时随在河南担任知县的父亲汪际虞生活,诵九经毕,又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
1904年考入河南客籍高等学堂,1909年被保送至京师大学堂英文科,看似跨界的专业选择,却让他得以在融通中西的学术环境中深耕中国文史。大学期间,他酷爱读书,为研读古籍写下七厚册读书提要,课余与胡先骕、姚鹓雏等文坛俊彦吟诗说文,更在阅读中完成了重要的诗学转向——早年偏爱晚唐李商隐、温庭筠“三十六体”的清丽婉约,入京后受陈衍、郑孝胥等前辈影响,转而深耕苏轼、黄庭坚等宋诗大家的作品,为后续学术研究奠定核心基调。

1912年毕业后,汪辟疆赴上海结识陈三立、邵力子、于右任、叶楚伦、苏曼殊等文坛巨擘,散原老人的奖掖让他更坚定了以阅读筑基、以典籍为友“读常见书”的理念。1915年,因父病故返乡守制,三年里,他潜心研读家藏古籍,于上海《亚细亚日报》发表最早的诗学著作《小春摩馆诗话》,文中对清代诗人诗作的精准评析,正是建立在海量阅读与深度思考之上。

抗战期间,他随校西迁重庆,数十年苦心收藏的万卷藏书尽失。这对嗜书如命的他而言是沉重打击,但他并未消沉,反而将书斋更名为“读常见书斋”,以“读常见书,做本分学”的理念自勉,在艰难环境中坚守阅读与治学,这份于困境中不离书卷的坚韧,正是赣人“负重前行、百折不挠”精神的生动体现。

2

作为毕生与书籍为伴的学者,汪辟疆的阅读实践始终将科学的书目指导为核心,其编制的推荐书目专门承担阅读指导任务,为读者拨开书海迷雾。

在他看来,“目录学者,提要钩玄,治学涉径之学也”,而推荐书目正是目录学“指示途径、分别先后”本旨的集中体现。针对胡适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被梁启超批评“混淆应读书与备书”,梁氏自编书目又嫌过多的问题,汪辟疆于1925年编纂《读书举要》,贯彻“少而精”原则,仅收130种书,更切合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。

他为学生开列的十种“源头书”——

《说文解字》《毛诗正义》《礼记正义》《荀子》《庄子》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《杜诗》,便是推荐书目的核心精华,强调“以此治基,固本,则日进辑照光明矣”。

这份推荐书目不仅选书精当,分类更具科学性:上篇设纲领、从载、稽考三部,收录入门书、名著与工具书;下篇分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文字学四部,涵盖专业性图书,类名简洁明了,更设二级类目细化分类,既“辨章学术”又便于检索。

他在提要中不仅指明版本优劣,如读《杜工部诗集》推荐仇兆骥纂本、杨伦简要本、钱谦益独到本,还传授阅读方法,如读《诗经》可择陈奂《毛诗传疏》、朱子《诗集传》或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,鼓励比较互观;更强调读全集的重要性,指出“选本多不能见其真面目”,如读白居易需阅全集方能领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的核心主张。

而他为霍松林题记的精简书目——《诗三百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太史公书》《水经注》《杜工部诗》,明确标注最优版本,要求“不可放过一字,不可滑漏一句”,成为治文者的入门宝典,完美诠释了推荐书目“为读者指路”的核心价值。

这些书目所选皆非罕见孤本,而是流传甚广的常见典籍,却在他的精准筛选与指导下,让“常见书读深读透”的阅读智慧得以彰显。这也为当代人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清晰的参照。

3

在专业研究领域,汪辟疆的阅读更是精准而深入。

宋诗研究是其重点方向,苏轼诗文集及其注评本是反复研读的核心文本,包括宋施元之《注东坡先生诗》、清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、王文浩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等,他甚至不惜重金购置湘刻《陆汪氏遗书》等珍贵注本,深入探析苏轼的源流与艺术特质。

在唐传奇与诗学研究中,他精读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及历代诗话,为《唐人小说》的编校与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的撰写积累了丰富素材。此外,他还广泛涉猎清代各家诗集,收藏清以来诗集、别集近千种,包括姚鼐《惜抱轩诗集》、乐钧《青芝山馆集》等,通过比对阅读梳理近代诗坛脉络,其阅读范围之广、钻研之深,令人叹服。

4

尤为可贵的是,汪辟疆不仅嗜读,更独创了一套科学高效的读书方法,将“读、思、写、用”融为一体,其《读书举要》《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》等文献中阐述的阅读理念,至今仍具指导意义。

他提出的“读书四法”——诵读法、阅读法、抄读法、参读法,强调“诵读口到,阅读目到,抄读手到,参读心到”,要求读者根据不同书籍与阅读目的选择恰当方法;诵读需熟读成诵,吃透经典韵味;阅读需提纲挈领,把握核心要义;抄读需摘录要点,强化记忆理解;参读需比对印证,拓展认知边界。

这套方法融合了自身治学经验,被学界誉为“平实有效之言,非惟中文系宜知,即他系及公务人员有志读中国书者,皆宜

置座右”。

在阅读态度上,汪辟疆强调“读书时必要伏案”“点读”,反对走马观花、浅尝辄止。他主张阅读需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不仅要理解文本本身,更要探究其学术脉络、时代背景与作者思想。

针对不同文本,他更总结出个性化阅读策略:读李商隐诗,提出“深晦的诗要浅看,明显的诗要深看,用事繁缛的要看虚字,纯用白描的要呼应”;读苏轼诗,注重“知人论世、编年考证”,结合苏轼生平与时代背景解读诗作深意;读目录学著作,则强调“明体例、辨源流”,掌握学术门径。这些阅读智慧,为当代人摆脱“浅阅读”“碎片化阅读”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
5

批注典籍是汪辟疆阅读实践的鲜明特色,也是他将阅读转化为学术成果的关键路径。浙江大学中文系所藏的光绪二十二年刻印《陆汪氏遗书》本《苏诗选评笺释》,便是他手批的经典范本,书中倾注了他多年校勘、考证与评点的心血,批注形式多样,包括眉批、题下批、诗旁批、诗末批等,涉及苏轼诗一百一十三首,展现了“阅读一思考一批注一创获”的完整治学链条。

其批注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:在校勘方面,他将本校、他校与理校融合,纠正《苏诗选评笺释》中的文本讹误,如指出查慎行将苏诗“爽中乱山”改作“夷牢”非是,引证苏轼诗作佐证其误;在考证方面,他对苏轼的系年、本事、典故详加辨析,如考订《守岁》诗作于嘉祐七年壬寅十二月,梳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相关文献,弥补前人注释不足;在品评方面,他既褒扬苏轼“骨老气苍”“神韵独绝”的特质,也客观指出部分诗作“后半乃陈言俗调”的缺憾,评语简捷精练,一语中的。

此外,他还在批注中补充原书目录、补录相关诗文,使典籍价值得以提升。这种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阅读习惯,让他在常见典籍中读出了新意与深度,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创见。

6

汪辟疆的阅读理念与治学方法,不仅成就了自身的学术高峰,更通过文人交往得以传播,影响了同期的国学大家,黄公渚便是典型例证。

友人所藏一册汪辟疆赠黄公渚的《方湖类稿》,为这一学术传承提供了实物佐证:该书为线装白纸铅印本,版心上部题“方湖类稿”,下部署“汪辟疆撰”,卷首有汪辟疆亲笔题字“奉诒公渚词长,即希指正,辟疆”,钤“汪”字白文小印,页间亦钤有黄公渚“蜀庵”印章,书中遍布黄公渚的朱笔批注,字迹细密、见解精到,足见其研读之用心。

黄公渚(1900-1964),原名黄孝纾,号蜀庵,福建闽侯人,是集古典文学研究、骈文创作、书画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家,曾任教于山东大学,与冯沅君、陆侃如等并称“五岳”,在版本目录学、金石学等领域造诣深厚,其骈文创作更是被时人推为“独步一时”。

他与汪辟疆有着相似的治学底色:均精于文献校勘与古典文学研究,均重视经

典古籍的深耕细研,更共享“批注读书”的治学习惯——黄公渚在课堂上常催促学生“把这几句圈下来”,自己的藏书也“密密麻麻画满了圈”,这与汪辟疆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主张不谋而合。

汪辟疆将凝聚自身学术思想与诗文创作的《方湖类稿》相赠,既是对同道的惺惺相惜,也是阅读理念的无声传递,而黄公渚的通篇批注,正是对这份理念的深度认同与实践回应,成为近代学界“以书为媒、以读会友”的佳话。

7

汪辟疆的阅读理念,核心在于“读常见书而有深见”,反对猎奇式追求孤本秘籍,主张在经典古籍的反复研读中探求真理。他的“读常见书”并非无奈之举,而是主动选择的治学立场——抗战藏书尽失后,他不叹惜于珍稀版本的流失,转而专注于常见典籍的深耕,认为“世间常见之书,足以窥学术之全貌”。这种理念在全民阅读语境下更具现实意义:当下书籍资源丰富,却有不少人陷入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、热衷冷门而脱离经典的误区,汪辟疆的实践证明,真正的阅读价值不在于书籍的珍稀程度,而在于读者的钻研深度。

汪辟疆的阅读实践始终注重根基、务实笃行、坚守初心。汪氏一生,勤于读书,手不释卷,自称“喜搯坟籍,往往午夜篝灯,一册就枕;又有善忘,久而茫然,爰置一册座席,偶有会心,辄命笔削”“结习所存,实在文翰……晨抄暇写,至味在胸……兹事之可乐”“诗书至味,盎然在胸”。他一生藏书近三千种,却不将书籍视为私产,晚年陆续将藏书捐给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,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经典;他讲学三十八年,始终将阅读方法与治学理念传授给学生,培养出程千帆、周祖谟等大批学者,让“读常见书,做本分学”的理念得以传承。这种以阅读育己、以书籍育人的情怀,与全民阅读“共建共享、涵养文明”的宗旨高度契合。

回望汪辟疆的阅读人生,我们能获得诸多启示:他的阅读清单告诉我们,经典古籍是阅读的根基所在;他的读书方法教会我们,高效阅读需要“眼到、口到、手到、心到”;他的批注实践示范了,深度阅读离不开思考与沉淀;他与黄公渚的赠书佳话,则让我们看到阅读理念薪火相传的力量。

这位赣籍学者,用一生践行了“阅读改变人生,治学成就传奇”的真理,证明了平凡的常见书籍,只要深耕细研,便能筑就学术的高峰;普通的阅读者,只要坚守初心,便能在书香中实现自我成长。

如今,汪辟疆的著作仍为学界必读经典,其“读常见书,做本分学”的治学理念,仍在激励着无数后学脚踏实地、潜心向学。

汪辟疆的阅读故事不仅是近代学术史的宝贵遗产,更是全民阅读的生动教材。愿他的阅读智慧,能引领更多人走进经典、深耕细读,在书香中涵养品格,增长才干,让江西崇文重教、笃实向学的文脉,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生生不息,让“读常见书而名震学界”的传奇,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。